

台灣走過戰後貧窮 與不安的歷程

周宏濤 著



F127.58

10

F127.58
10

台灣走過戰後貧窮 與不安的歷程

周宏濤 著



宏濤兄存念
弟匡國

台灣走過戰後貧窮與不安的歷程

周宏濤 著

出版單位 凌 天 出 版 社
地 址 香港干諾道西188號
電 話 (852) 25475501
傳 真 (852) 28582437
印刷單位 寧波聯邦印務
出版日期 二〇〇六年八月
第二次印刷 3001—6000冊

書號: ISBN 988 — 98070 — 5 — X

序 言

孫 震

近年以來，台灣經濟成長遲滯，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生困苦，鋌而走險者有之，自殺者有之。更悲哀的是政府不能掌握正確的方向，提不出有效的政策，甚至本身就是阻礙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讓人民看不到希望，因此越來越多的人懷念過去創造經濟奇迹的時代，以及帶領民間，克服困難，脫離貧窮，走向富裕的財經首長。

台灣在二戰時期遭受戰爭破壞，生產能量大幅降低，光復後，受大陸經濟拖累，發生嚴重物價膨脹。中央政府遷台前後，大量軍民移入，使人口迅速增加，加重經濟的負擔。然而政府致力穩定物價，發展經濟，使台灣經濟快速成長，一九七〇年代發展重化工業，一九八〇年代發展資訊電子工業，九十年代成為世界科技產業的重鎮。直到二十世紀結束之前，台灣都被視為世界發展中經濟的楷模，台灣所採取的政策為國際著名經濟學家所稱道，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所遵循。台灣何以能做到？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才。

我曾引用諸葛亮在其《後出師表》中的一段話，比喻

台灣在經濟發展中所特有的人才：“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imon Kuznets）觀察台灣經濟發展的條件，有下面一段分析：

“當時日本人撤離，台灣的人口大約有六百萬強，增加這一大批文化與歷史背景相同，但社會與經濟經驗不同的人口，對於後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是一項重要的因素。可惜我們對構成多數之本省人和構成少數之大陸人的社會與經濟特性，都缺少資料與分析。我們對大陸人之中祇小部分在政府工作，在專業方面居于高級之職位，且以後負責經濟成長決策之人士，尤其感到興趣。然而我們對他們的背景和經驗，所知尤為有限。”

台灣最為人懷念與稱道的財經首長，主要有嚴家淦、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俞國華等人。以上排列的次序大致反映他們在財經領域開始發生重大影響的先後。顧志耐先生于一九七五年來台研究台灣經濟成長，後來撰成《成長與結構轉變》一文，上引文字就是出自此文。顧志耐在台停留一個月，由經濟設計委員會負責接待。

經設會是行政院의財經幕僚機構，由原來的行政院經濟合作暨發展委員會改組而成。蔣經國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兼經合會的主任委員。一九七二年出任行政院長後，可能因為經合會的業務膨脹，侵及相關機構的法定職掌，

于一九七三年改組經合會，降編為經設會。經合會的委員由相關部會首長與省政府主席組成，經設會的委員則為相關部會的副首長。由于經設會的會級降低，失去了政策協調、整合的功能，這一任務祇有由行政院長自己承擔。因此蔣院長因應一九七三年末季的世界能源危機和物價膨脹，構思一九七四年初的“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周諮博采，不但十分辛勞，而且必然承受很大的壓力。一九七四年，他接受一些經濟學者（包括我自己）的意見，成立“財經五人小組”，負起財經政策協調、整合的責任，而由經設會擔任幕僚工作。“財經五人小組”的成員包括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財政部長李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主計長周宏濤和行政院秘書長費驊，由俞國華為召集人。五人小組于是成為政府的財經事務方面新的決策階層。

我自己很幸運，服完兵役後曾在美援會工作，後來受政府征召擔任經設會的副主任委員，對嚴家淦、尹仲容以來的財經決策人士都有親身的接觸，更多冷眼旁觀的經驗。我覺得他們有以下共同的特點：（一）他們都是中國傳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君子；他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重視原則，不謀自己的利益。（二）他們都受有完整的現代教育，處事冷靜、理性，長于分析，不為意識

型態所惑。（三）他們都經過長久的歷練，有廣泛的經驗，眼光高遠，而在細節上精明謹慎。簡單的說，他們都是有見識、有能力、負責盡職的好公務員。其中周宏濤，可能由于長期擔任主計長，負責政府預算與全國統計工作，并非站在經濟發展第一綫發號施令，因此和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比起來，較少為一般大眾所知。

周宏濤先生是浙江奉化人，和兩位蔣總統既是同鄉，又有姻親關係。他的祖父駿彥公是蔣中正總統童稚時候的老師，後來長期追隨蔣公，曾擔任軍政部軍需署長。宏濤先生一九三四年考入蘇州東吳大學，先讀生物系，後轉政經系，一九三九年從借讀的武漢大學政治系畢業。同年參加第二屆全國公務員高等文官考試錄取，是普通科唯一錄取的考生。一九四三年五月進入蔣公的侍從室，擔任機要秘書，準備接替即將出國讀書的俞國華。俞先生曾隨蔣公經歷西安事變，參加開羅會議，一九四四年出國，先後在美國哈佛大學和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研習經濟學。

宏濤先生追隨蔣公，經歷抗戰時期的艱苦、勝利後短暫的喜悅、惡性物價膨脹與對共軍戰事的失利。一九四九年蔣公引退，國軍潰敗，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二月底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翌年三月一日蔣公復職，在台灣發展經濟，延續中華民國的法統，光大中華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後面一點，我覺得其歷史意義

更為重大。

和俞先生比起來，宏濤先生在蔣公身邊的日子更久，關係可能更接近。蔣公復行視事後，發布他為總統府機要室主任，每星期大約有四天與蔣公同車上下班。他在車上坐蔣公左側，向蔣公報告重要公事，記錄口授批答，沒有公事的時候亦常交談，有時向蔣公表示意見，甚至直言進諫。宏濤先生在他口述的《蔣公與我》中說：“蔣公度量很大，通常笑而受之”。從蔣公復職前的二月開始，宏濤先生奉命代蔣公批核公文：蔣公口授批示內容，由宏濤先生當面寫在公文上。

一九五二年，宏濤先生以36歲的英年，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負責黨政關係，加強與立、監兩院國民黨籍委員的溝通、聯係，以支持蔣公的施政理念，成效顯著，很受蔣公肯定。他任國民黨副秘書長6年，于一九五八年調任財政部政務次長；一九六二年改調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在財政廳任內，加強稽徵，充實地方財政；成立稅務局，整頓稅收，並籌措國民教育從6年延長為九年所需的經費。宏濤先生于一九六八年出任行政院主計長，他擔任主計長將近10年，于一九七八年轉任政務委員，兼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經建會是在他的建議下由經濟設計委員會改組而成。

行政院主計處掌理政府預算與全國統計。在宏濤先生

擔任主計長期間，台灣經歷一九七三年的第一次能源危機和能源危機後的經濟衰退，政府并大力推動十大建設，支出遽增，但政府預算始終保持盈餘。主計長不是站在第一綫指揮作戰的英雄，然而後勤工作如不能籌足兵馬糧草，前綫的將軍也不可能成就其為眾人歌頌的事功。

主計處所主管的統計工作更是在默默無聞中進行。主計處于一九五三年以聯合國一九五二年所發表的國民會計制度為藍本，編算台灣的國民所得，并追估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國民所得，成為亞洲地區首先采行國民會計制度的國家，其後逐年編算發布。為求不斷改進，主計處復于一九六五年成立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聘請有關機關與學術界經濟統計專家為委員，評審編算結果，提供改進意見。我在經建會時期曾任委員，到台大就任校長後才辭職。我記得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政府邀請七位世界級經濟學家，包括前述顧志耐先生，來台灣參觀訪問、搜集資料，以其不同專長，撰寫台灣經濟發展論文，由康乃爾大學葛蘭生（Walter Galenson）教授負責編成《台灣的經濟成長與結構變動》（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一書，于一九七九年由康乃爾大學出版。我當時在經設會負責接待這些學人。葛蘭生教授有次對我說，台灣的統計資料豐富像金礦一樣；不過他又說，統計資料必須不斷利用才會發出光芒，透露有意義的訊

息。

主計處很早就有電子計算機的設置，以處理普查與會、統資料，並支援其他機關大量資料的處理。一九七一年行政院成立電子處理資料審議委員會，審議政府機關、學校、公營事業等裝置電子計算機計劃，並考核其利用成效。此一委員會後改組為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繼續資料處理工作及辦理規劃、審議工作。因而主計處後來成為政府機關推動資訊化的督導單位，而宏濤先生和李國鼎先生成為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的共同召集人。

我正式認識宏濤先生是在一九七四年五人財經小組開始運作之時。五人小組成立後，每星期三中午聚會一次，由經設會的正、副主委和重要幕僚人員列席，就重大經濟問題交換意見，得到共識後向行政院建議，或交經設會研辦。我記得第一次能源危機後，台灣發生嚴重的經濟衰退，五人小組要求經設會派我到南韓訪問，研究南韓的發展策略。我回國後建議將新台幣貶值，降低利率，但未為政府接受。

一九七七年，政府派宏濤先生率經濟部、中央銀行、主計處與經設會的專家到韓國作較長時期、全面性之參觀訪問，以借鏡彼邦發展經驗，我也奉命隨行。這是一次重要的考察之旅。我們在韓國歷時三周，除拜會政府首長、企業領袖與經濟專家外，並赴各地參觀重要工業發展，包

括石化、鋼鐵、造船、機械、電子等。

韓國之經濟發展較台灣起步為晚，一九六二年起始有計劃性的發展，從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年經濟成長率雖低于台灣，但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各年之經濟成長率均遠比台灣為高。大致言之，韓國物價膨脹率高，國內儲蓄率低，對外貿易連年逆差，依賴國外資金流入維持快速成長。唯物價膨脹導致韓幣貶值，致使按美金計算之國民所得及其成長率降低。台灣則國內儲蓄率高，物價與匯率穩定，貿易出超，人均所得始終較韓國為高。一九七〇年代兩國政府官員、學者專家絡繹于途，互相訪問，以切磋發展策略。

考察團返國後向政府提出報告，其中第一個建議就是改組經設會，提高其位階與職權，使其負起國家經濟發展計劃、設計、推動、協調與監督之責。不久政府改組經設會為經建會，就是根據宏濤先生的建議。其他建議後來經政府陸續採納實施的，包括[加強對外貿易協會]、[改組工業技術研究院]、[機動調整匯率]等。考察團並建議依照“韓國經濟開發研究院”(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KDI)設置[經濟發展研究院]，但未為政府接受。不過後來中美斷交，國民黨組成六個工作小組，研擬因應之道，經濟小組由李國鼎、辜振甫和我為召集人，再提成立經濟發展研究院之議，終獲政府同意，由經建會籌

設現在的[中華經濟研究院]。

後來政府推動資訊工業發展，由宏濤先生率團到日本觀摩[資訊周]，並參觀無人工廠和機器人操作，我也隨團前往。這次參訪後，台灣開始每年有[資訊月]，展示資訊產品和資訊化生活與工作。談到台灣的資訊工業發展，大家都知道李國鼎先生有很大的貢獻，其實宏濤先生也是一位重要的功臣。

宏濤先生還有很多重要貢獻較少為人所知，例如中正紀念堂和世貿大樓的興建等。

宏濤先生行事謹慎、守分、不伐善、不施勞。這原是他的美德，可是他在《蔣公與我》中却說：“他（蔣公）那麼器重我們，我自己却没有重視自己以圖回報，祇想要達成所交付的任務，沒有展現更大的企圖心，做得更多更好；祇想守分，沒想更遠。”他如此發自內心的謙抑，讓我十分感動。

宏濤先生為人誠懇、正直，講話坦率，對老蔣先生也直言進諫。友好們最敬重他沒有一般政治人物的世故和機心。他是一位誠篤君子，雖然歷經世變，仍保有赤子之心，我覺得真是難得。宏濤先生對朋友很體貼，他平日喜歡打高爾夫球，打高爾夫是一項運動，也是一項重要的社交活動，可是因為我不打高爾夫，我們在韓國三星期，他取消一切打高爾夫的活動。宏濤先生善飲，但我稍飲輒

醉，也不能陪他喝酒。我有時候恨自己是無趣的書呆子。

宏濤先生于二〇〇四年二月逝世後，夫人魏燕芝女士整理遺著，撰取有關財經的文稿十六篇，交由宏濤先生堂弟周子正先生按發表先後編排成書，在香港刊印。題為《台灣走過戰後貧窮與不安的歷程》，每篇之前由樓文淵先生撰寫提要，藉以使觀閱者瞭解該文的時空背景及其發生的效果。周夫人囑我寫序，我覺得十分光榮。

追憶宏濤先生的事功與我和他的交往，往事歷歷而斯人已逝，怎不感傷！然而宏濤先生是幸福的。他在世的時侯受人信賴、尊敬，死後為人懷念，特別是自一九七五年六月和魏燕芝女士結縭以後，不但在生活上得到夫人的照料，在事業上也得到她的幫助。夫人畢業于東吳大學，曾任職美商銀行，雍容多識，行止得宜，讓宏濤先生于淡出政壇後，得享更幸福的家庭生活。我向周夫人敬致祝福之意。

孫震2006年3月1日
于台灣大學校友總會

孫 震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八日出生，籍貫山東省平度縣。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經濟學博士。

曾任職于台大經濟系，從助教、講師、副教授到教授。一九八四年接長台灣大學，前後八年有余。

曾擔任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九九三年出任國防部長，卸任後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現任元智大學管理學院遠東經濟講座教授，並為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除專業論文外，中文著作有《總體經濟理論》、《成長與穩定的奧秘》、《邁向富而好禮的社會》、《邁向已開發國家》、《發展路上艱難多》、《回首向來蕭瑟處》、《台灣發展知識經濟之路》、《時還讀我書》、《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人生在世》等書。

目 錄

序言	1
台灣如何面對戰後的貧窮與不安	1
台灣土地政策與土地稅制問題之研究	15
當前政府預算政策	61
輔導中小企業發展的途徑	77
二十五年來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的比較研究	86
現代公務員應有的工作觀念	124
黃金價值及其功能的演變與展望	143
奢侈與國民經濟發展	159
我們民族的經濟習性與經濟發展	167
主計十年的體驗與今後的展望	179
台灣財政管理制度	190
行政院慶生會講詞	229
我國為什麼必須資訊化	231
生日感言	243
對於亞洲金融風暴的觀察	247
台灣經濟風暴及其有關問題	254
附錄一：周宏濤先生傳略	258
附錄二：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興建記	265
附錄三：台北世貿中心平地起	267
附錄四：獲頒勳章政事	270

附錄五：蔣中正先生批給周宏濤秘書四函（手迹）	272
附錄六：蔣經國先生致宏濤二函（手迹）	276
附錄七：先祖父駿彥公墓志銘	278
附錄八：先祖父駿彥公任軍需署長時公函手迹	280
附錄九：先祖父駿彥公悼陳英士挽聯	281
附錄十：《蔣公與我》自序	282
附錄十一：HOW TAIWAN FACED POST-WAR POVERTY AND INSTABILITY	284
附錄十二：連戰題照	291
附錄十三：孫運璿題詞	292
編後語	293

台灣如何面對戰後的貧窮與不安

——所謂台灣經濟經驗的故事與檢討

(1945年—1977年)

台灣光復之初，由于遭受日據時代的大肆掠奪和破壞，民生凋蔽，經濟危殆。著者去台後，即對當時台灣經濟情況與民生改善問題加以密切關注與探討，并時為當局貢獻建言，俾益日後經濟之發展至鉅，功績卓著。



—編者—